

为了变革而认识

——黄仁宇对“洪武型财政”的病理分析*

高寿仙

【提要】 黄仁宇对明代漕运和财政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其历史观念的基点。他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财政体制称为“洪武型财政”,认为这种体制长期僵化不变,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黄仁宇提出的“洪武型财政”,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但也受到一些专业学者的严厉批评。事实上,黄仁宇的史学研究与学院派大异其趣,也难以用学院派的标准去衡量。他的史学研究是从其身经战乱的独特经历生发出来的,从本质上说属于“为了变革而认识”的“政论史学”;而其所说的“洪武型财政”,可以视为一个突显明代以降财政以及社会和国家体制之“荒谬”的统摄性概念。尽管其立场与观点存在明显偏颇,但如果仔细体会黄仁宇对明代财政体制的具体评述,可能会发现不少“片面的深刻”之处,强烈的批判意识确实使他洞察到明代财政存在的一些体制性缺陷,他提出的一些具体论断也颇有启发性。

【关键词】 黄仁宇 洪武型财政 学术旨趣

引言

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以《万历十五年》蜚声海内外,但其学术生涯的起点和根基,乃是对明代漕运和财政的研究。1974年出版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①是他一生最具学术性的著作。他曾回忆说“《财政与税收》一书的准备经过7年,以后我写《万历十五年》则只花1年。因为以前之摸索,即已奠定了以后研究之基础。”^②他还谈道“我的一本专著为《16世纪明代财政及税收》……我对中国迄至现代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观念,肇始于此。”^③不过,在很长时间里,他的这部代表作并未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直到他因一系列通俗作品博得盛名之后,这部著作才姗姗来迟地被译成中文,到他去世第二年才正式出版。^④至于他196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明代的漕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代价格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ZDA192)的阶段性成果。

① Ray Huang,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②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在《中国大历史》中,他也谈到《万历十五年》的观点“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之心得”。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中文版自序”,第3页。

③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7页。

④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运》^①，尽管自己表示并不满意^②，盛名所及，也在他身后译成中文行世。^③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对明代财政管理体制的尖锐批评和全面否定，其核心观点都浓缩在“洪武型财政”这一概念中。根据黄仁宇的说法，这一概念是从梁方仲的著作中借用过来的。梁方仲对明代赋役变革进行了透彻研究，他一方面深刻揭示了一条鞭法在减轻贫雇农负担、促进原始资本积累、改变人民与政府间关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一条鞭法最多只能暂时缓和旧制度解体的危机，却不能解决社会根本矛盾”，“因之，洪武型的封建生产关系并没有多大的改动”。^④由于研究主题是明代财政体制，故黄仁宇将“洪武型的封建生产关系”稍加变更，提出“洪武型财政”这一新概念。

该书英文版出版后，国外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罗茂锐（Morris Rossabi）、居蜜（Mi Chu Wiens）、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等在专业期刊发表简评，一致肯定该书具有开创意义。伊懋可认为，该书是基于大量工作的开创性著作，任何对帝制中国晚期的政治和经济感兴趣的史学家都会从中获益；罗茂锐指出，黄仁宇付出艰巨努力完成了一项开拓性工作，为分析明朝的财政结构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组织框架；居蜜幽默地谈道，尽管售价很高，这部令人钦佩的开拓性著作必将被放到明清史“必读书目”之中；傅吾康指出，通过全面而透彻的考察，黄仁宇不仅对明代制度史和经济史，而且对于我们理解最近六百年的中国国家以及这种传统对当代的影响，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同时，他们也提出一些建议和批评，其中以伊懋可的批评最为尖锐，他认为该书虽然提供了大量细节，但这些细节未能恰当地支撑其论点，而且有些讨论虎头蛇尾，间或逻辑模糊，某些立论缺乏内部连贯性和充足证据。^⑤

该书译成中文出版后，虽然内容较为专业，但借助作者的知名度，在社会上也引起不少关注，陆续发表了一些肯定性的介绍文章。^⑥但一些专业学者对其持保留态度，如李龙潜认为，黄仁宇“明代历史‘倒退论’的观点违反了客观史实”，“夸大了定额制度推行的力度及其对明代财政的负面影响”，引文及说明方面存在很多错误；^⑦万明认为，黄仁宇的“洪武型财政”说，不仅受到“西方中心论”史观的影响，而且忽视了明朝中央大型财政数据文献的利用，致使立论根据严重不足，对一些基本史实存在误解。^⑧如果以专业的眼光挑剔，该书确实存在一些史实和理解上的错误，其对明代财政特点的总结和批评也失于片面和极端；但另一方面，片面性和极端化也使问题凸显，有助于人

① Ray Huang, *The Grand Canal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4.

② 黄仁宇在一次演讲中谈道：“我希望各位不要问及我的论文，虽说被学校通过，但不是我自己可以感到非常愉快的作品。”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第58页。

③ 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张皓、张升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参见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64页。

⑤ Ray Huang,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 Review by Mark Elv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39, No. 1, 1976, pp. 202-204; Morris Rossabi,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 10, No. 1, 1976, pp. 82-83; Mi Chu Wien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5, No. 2, 1976, pp. 314-316; Wolfgang Franke,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64, Livr. 4/5, 1978, pp. 331-337.

⑥ 曹钦白《洪武型财政的历史剖面——介绍美籍华人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税收与社会》2002年第4期；余轶峰《论明代“洪武型”财政》，《金融经济》2006年第10期；李铁《明代的“大跃进”：明代铸钱量只相当北宋两年》，《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0年第3期。

⑦ 参见李龙潜《也评黄仁宇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明清论丛》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⑧ 参见万明《16世纪明代财政史的重新检讨——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史学月刊》2014年第10期；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0—88页。

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明代财政的深层结构及其变化限度。本文是本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从黄仁宇的学术理路出发,对他提出的“洪武型财政”作一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不妥之处,尚望学界同仁指教。

一、黄仁宇的学术旨趣与问题意识

阅读黄仁宇的论著时,我经常想起日本学者竹内好。竹内好与黄仁宇对于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基本认识和未来期望全然不同,^①但在学术旨趣上却有共通之处,他们都把自己的切身经历融入学术研究中,形成了与学院派不同甚至对立的立场和方法。在写于1952年的《给年轻朋友的信——对历史学家的要求》中,竹内好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为了变革而认识和为了认识而认识,难道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吗?”对于这个疑问,竹内好其实是有自己的明确答案的,他认为“在历史学领域,或者以历史为线索,在努力完成这个自我变革的过程中揭示出问题来,才是历史学的课题”。^②

黄仁宇的史学作品,无论是学术性的还是通俗性的,都不是“为了认识而认识”,而是“为了变革而认识”,带有强烈的“政论史学”色彩。^③这类作品富有感染力,但也不免使人感到有点难以捉摸。黄仁宇曾谈道,“大凡有创造能力的思想家,在大刀阔斧的姿态下开始立论的时候,常有自相矛盾的现象”,但他认为这种矛盾“在大范围内则不成其为矛盾。亦可以说因其矛盾,更能与真理接近”。他引用康德所谓“了解”(verstand)与“理解”(vernunft)之不同,认为“前者得自我们的视听与经验;后者则在人类经验范围之外,应属于神学的领域”。^④黄仁宇的“大历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这种“神学”性格,正如他反复申说的“凡是在世事中作大范围的检讨,不期而涉及神学。”^⑤“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⑥因为形成独特的“大历史观”,黄仁宇对学院派的研究方法颇不满意。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不一定是独立的单元。在很多情形之下,其因果互相重叠,很多朝代的历史可以连贯的解释。”他认为,“这样大历史(亦即macro-history)的检讨中,用学院派系disciplinary approach的方法不容易找到正确的结论。”^⑦

黄仁宇的这种学术旨趣,与其生长于乱世并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的独特经历相关。他曾明确谈过自己转入历史研究的理由“我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⑧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其他学者恐怕不敢想像的宏大目标“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

① 参见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② 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268—271页。

③ 关于黄仁宇的历史观念,刘季伦作过系统分析。参见刘季伦《历史与自由——评黄仁宇的历史观念》,《新史学》第13卷第3期,2002年11月。

④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32—33页。

⑤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第94页。

⑥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3页。

⑦ 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第35页。黄仁宇的这种风格也导致他遭到学院派的排斥。据其自述,1975年之前,他八次申请研究经费,核准六次;之后又申请七次,但没有一次通过。他分析没能通过的原因之一,就出在他的“大历史观点”。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张逸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90—491页。

⑧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403页。

密切观察 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 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 直到两者融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①说是东西交汇和融合 其实主要是单向的 他大力提倡“西学为体 中学为用”^②认为“中国可能必须采取综合主义 将现代西方的种种观念及原则融合而一”。^③他曾毫不讳言地表明自己观察中国的根本立场“我对中国向来站在批判的角度 无论是对中国政府或中国文化。”^④黄仁宇的各种论著 都在反复申说这样一个观点“传统中国历史的发展 与西洋史、美国史和日本史完全不同。中国地广人多 政治组织初期早熟。其结构只注重上端的理想 不注重下端的实际情形 所以规模庞大 表面冠冕堂皇 实际内中结构松脆 效率极低。换言之 这是一个农业社会的特殊产物 无法在现代世界生存。”通过对传统中国的否定和批判 他希望为中国历史发展指出一条正确道路“宏观看来 中国历史仍有它的规律与节奏 其目的是脱胎换骨 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融合于世界的潮流 即完成所谓的现代化。”^⑤

黄仁宇选定明代漕运作为博士论文题目 可能有些偶然 但他把明代作为研究重点 却是其学术旨趣的自然结果。在他看来，“当代中国的背景必须回溯自帝制时期的过去”。清朝在时间上离当代中国最近 但其“政治历史受到外族统治的太多扭曲 后期又在与西方冲突阴影的笼罩之下”而“明朝是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朝代 在体制上应该更能代表中国的特色”。^⑥黄仁宇对于明代以及传统中国的根本认识 在其博士论文中已经基本成型。他批评“明代帝王和大臣在财政金融方面从来没有方法意识和成本意识”，“他们随意处理财政问题”，“从未发展出一套有水平的金融体系”；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僵化不变的经济观念”，“制定的政策和习惯做法严重地限制了商业的发展”。他还特别强调，“导致错误管理的是被扭曲的思想观念 而不是技术缺陷。”^⑦

至于《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则是其博士论文的自然延伸。据他回忆 他在1966年决定撰写一本明代税制和政府财政的专书 1969年向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提出资助申请 得到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充分肯定 向其提供一笔研究经费。但是 他很快就发现难以按费正清的期望撰写 因为他无法整理出一个清楚的逻辑。^⑧当时有专家建议以杜希德的《唐代财政管理》为范本^⑨但黄仁宇认为这个建议不切实际 因为“唐代管理的整齐明确植基于组织上的简约”，“但千年后的16世纪 中国却深陷于生产稻米的复杂机制中”。^⑩明代财政比唐代复杂 或许只是表面因素，

①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71页。

②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第24—25页。

③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63页。

④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78页。

⑤ 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第229、241页。所谓“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 management) 有人仅从“数字”方面去理解，并不准确。黄仁宇自己曾解释说“在数目字上管理亦即全民概归金融及财政操纵 政府在编制预算、管理货币、厘定税则、颁发津贴、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时 即已普遍地执行其任务 而用不着张三挨打 李四坐牢 用‘清官万能’的原则 去零星杂碎地去权衡各人道德 再厘定其与社会‘风化’之影响。”(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3—224页)可见黄仁宇所说的“在数目字上管理”实际上就是从技术角度对资本主义运行原理的通俗概括 他一向“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之展开视作两位一体”(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第238页)。

⑥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162页。

⑦ 黄仁宇《明代的漕运》，第226—233页。

⑧ 黄仁宇曾详细回忆此书撰写和出版的过程 参见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249—279页。

⑨ Denis C. 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中译本参见杜希德《唐代财政》，丁俊译，中西书局2016年版。

⑩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273页。

其实包括唐代在内的各个朝代,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也都有各自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黄仁宇之所以不肯那样写,是因为在他看来,崔瑞德处理的是唐代财政的“理论面”,而自己处理的是明代财政的“实际面”。他把这项工作定位为“以荒谬的制度为研究主题”,^①认为“努力将混乱的制度进行逻辑整理分析可能有利于读者的理解,但同时也容易模糊了其所希望表达的主题,叙述者的角色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位财政改革家,而不是一位财政史学家”。^②换句话说,黄仁宇业已判定明代财政是“荒谬的制度”,所以他绝不肯像崔瑞德那样从“理论面”处理,为明代财政整理出一套明晰的体系,因为那样就会使明朝财政看起来不那么荒谬甚至合理化了,从而“模糊了其所希望表达的主题”。

二、“洪武型财政”的基本内涵和历史定位

明白了黄仁宇的学术旨趣和问题意识,或许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写作方式。黄仁宇在讨论资本主义时说过“资本主义生理家与病理家的观感比较,一定也有很大区别。”^③他又谈道“对现代经济组织采取‘病理家’的地位一定和一个‘生理家’的地位迥然不同。”^④因着眼点不同,黄仁宇在评述中西历史时采取了相反立场:对于西方,因重在探究其兴起之因,所以采取的是“生理家”的立场;对于中国,因重在探究其落后之由,所以采取的是“病理家”的立场。^⑤《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就是他为明代财政开列的一份“病理分析报告”,用他自己的话说,“贯穿这一研究的中心点是各个层次的制度性的缺陷”。^⑥而他提出的“洪武型财政”,则是集中呈现明代财政体制之“荒谬”的一个统摄性概念。关于这个概念的含义,黄仁宇曾作过简要概括“什么是‘洪武型’的财政?简言之,为缺乏眼光,无想像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生产,忽视供应行销以及质量上的增进。”^⑦如果把他各种论著中散漫的论述归纳一下,大约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其一,“洪武型财政”是逆历史潮流的退步性制度。朱元璋创立的政治结构,“在中华帝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财政的建置就不能按照历史先例来设计。尽管明代财政制度表面上与中国历史中以前几个王朝的财政组织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从一开始它的运作就与以前不同”。^⑧相对于唐宋,明朝出现了全面性的、根本性的“大跃退”。就基本性格而言,“唐宋是外向的,明朝是内向的。唐宋是‘竞争性’的,明朝是‘非竞争性’的”。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观察,“赵宋以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作为行政的根本”,“提倡商业,在造船、铸币、开矿、榷税、专卖酒醋各部门下功夫,不以重新分配耕地作创立新

①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246页。

②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409页。《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中也谈道“如果贸然将现代社会科学套用到主题上,我的角色将从财政史学家转变成财政改革家。”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262页。

③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492页。

④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130页。

⑤ 黄仁宇在《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一文中谈道“中国政治社会的庞大组织,是超时代的早熟,它的缺点没有充分暴露之前,尚为中外景仰……只是本文旨在提供迄至近代中国仍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原因,只能以‘负因素’作根据。”(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152页)事实上,黄仁宇的所有论著,都是为了发掘中国历史中的“负因素”。

⑥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428页。

⑦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192—193页;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222页。

⑧ 崔瑞德、牟复礼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朝代的基础”；而“明朝的政策，缺乏积极精神，虽然严格地执行中央集权，却不用这权威去扶助先进的经济部门，而是强迫它与落后的经济看齐，以均衡的姿态，保持王朝的安全”。^①从管理角度观察，“明代的财政管理具有收敛性（self-denying），它将其运作能力降到最低限度，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的策略，拒绝考虑民间、私人方面的帮助”，因而“比以前诸如唐代和宋代所使用的方法倒退了一大步”，甚至还不如元代的制度。^②

其二，“洪武型财政”是简陋落后的不合理制度。这在明代财政的各个方面都显现出来，其中突出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税源过分依赖农业经济。明代“一反以前几个王朝注重从贸易和商业中获取收入的共同倾向”，“依靠农业收入作为国家收入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宋代，甚至多少超过了晚唐”；而包括钞关税、商税在内的杂色收入“尽管税目非常多，但是税收总额却比较小”，“这相对于帝国的需要而言，则十分可怜”。^③第二，税收结构过于复杂。在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明代的税收结构极其复杂，造成“殷实大户逃避税收以及乡村收税人、吏胥的腐败和滥用职权”等问题。^④第三，定额制度过于僵化。这至少导致两种结果，一是限制了税收基数的扩展，以致“明代的财力要比四个世纪前的宋朝差了很多”；二是造成“可伸缩的财政单位”，“不仅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而且也给会计工作造成了很多问题”。^⑤第四，缺乏中间层次的后勤保障。其弊端一是“侧面收受”（lateral transactions），“唐宋间财政的收支，已渐有总收总发的趋向”，而明朝“全国财政资源，分成无数的细枝末节，由最下层的收支机构侧面收受”，“这样一来全国盖满了此来彼往短线条的补给线”，“一个接受的仓库可能同时要面对很多不同的解运者，而一个解运者也可能为很多部门服务”，造成赋税解纳的低效率和高成本；二是无法利用市场功能，唐宋时代的转运使综合地区财务主管、运输官员、采购代理于一身，“已经利用税收进行贸易，而明代的税收政策则让大部分的硬通货撤出流通领域”。^⑥第五，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明初滥发宝钞导致宝钞大幅贬值，而“宝钞的破产引起了连锁的反应，导致了铜钱以及后来税收管理中用银的失败”，明朝政府“完全失去了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这就意味着明朝的财政管理者在履行其职责时缺乏必要的手段”。^⑦第六，徭役使用重新恢复。“凡赵宋王朝自王安石以来，民间向官衙无代价服役，已开始缴款代役者至此又全部恢复亲自到差”，“各级衙门所用文具纸张，桌椅板凳，军队所用兵器弓箭，公廨之整补修理均无预算之经费或供应之承办者，而系无费由各地里甲征集而来”。^⑧

其三，“洪武型财政”是缺乏变化的僵硬制度。宋朝财政官员“就已经发现要不断调整政策以利经济增长，这样可以在不增加人民税负的前提下增加国家的收入”，而明代却将前代的那些财政策略和手段几乎全部抛弃。^⑨朱元璋制定的总计划，一直被盲目地坚决执行着，“明朝的财政管理

①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66—68页。

② 崔瑞德、牟复礼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第100页；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426页。

③ 崔瑞德、牟复礼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第98、149页；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297、340页。

④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111—127页。

⑤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55—56、59—60页。

⑥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52—53、62—63、239页；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167、188页。

⑦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81—93页。

⑧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2、255页；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221页。

⑨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420—421页。

在各个方面从未跳出过‘洪武型’模式,僵化不变,其中心的思路是抑制而不是发展”。^①明代中叶以降,“明廷虽然不得不面对非常复杂的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但是从未全面重新组织具有生机活力的制度,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在机构设置方面,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实物经济转变成货币经济,实物税收和强制徭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折纳白银,金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代替”,然而却“很少建立起新的财政部门,而被取消的财政部门则更少”。在赋役制度方面,面对里甲制度和役法已经不合时宜的现实,“尽管采用‘均徭法’和‘一条鞭法’作为补救,但整个明代这些农村基层组织从未被废除,政府的各项工作开支直接派征于乡村的财政体制也没有被废止”。在税收原则方面,明初确定了税收定额,“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后来也偶尔进行过小的调整,但基本定额从来没有被摒弃”。在后勤保障方面,“由洪武皇帝建立起来的后勤保障体系从来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改革”,普遍化的赋役折银并未改变这种状况,“认为使用白银是财政管理上的一个重大改进的想法,没有什么实质的理论意义,它不过是类似于在不同的乐器上演奏同一种曲调罢了”。^②对于得到很多学者充分肯定的张居正改革,黄仁宇也评价甚低,认为张居正对财政制度的重新安排“没有创新”,带来明显的“负面效果”,他大力提高白银储备,“这些紧缩措施的结果可能是弊大于利”。^③

需要指出,《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完稿于1971年,当时黄仁宇已53岁。但考虑到他1964年获得博士学位时已46岁,这部著作可算是他学术生涯前期的作品。此时,他关注的主要是作为现代之近源的明清,所以对“洪武型财政”进行了猛烈抨击,而对于宋代财政体制多有赞誉,甚至可以说,他实际上是把宋代财政描述为明代财政的一个相反影像。不过,随着把眼光投向更久远的历史,他对“洪武型财政”的认识便增加了一个新的视角。

黄仁宇视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为“第三帝国”,认为第二帝国是外向的、带竞争性的,第三帝国是内向的、非竞争性的。在他看来,由第二帝国到第三帝国的性格变化,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他从财政角度分析指出,宋朝从一开始“就以最前进的部门,作中央施政的基础”,王安石新法也重在“加速金融经济,使财政商业化”。但这套政策要行得通,需要“民间的金融商业组织,也要成熟,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更要有法制的保障,这样才能重重相因,全面造成凡物资及服务都能互相交换”。宋朝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其财政制度在技术上“不能与大多数的小自耕农的低层机构配合”,“反不如北方少数民族以一种单元的经济,简捷的将人马食粮投付于战场”。但辽、金自进入中原后逐渐受到多元经济的影响,“也都陷入宋人之覆辙”。元朝只是第二与第三帝国间的一个过渡阶段,统治者“始终没有对南北之不同,商品经济与金融经济无法统筹经理的问题作切实的解决”,“当它在财政上无法突破,让税收数迟滞于低层,又强调‘农业第一’的情形下,它实际上已将第三帝国的收敛态势预告提出”。上述历史背景,正是“造成明太祖朱元璋创制的财政体系的逻辑”。^④

正是基于这种思路,黄仁宇虽然依然坚持从现代向上看明清,认为“从全世界发展之过程上

①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288页。

② 黄仁宇《明代的漕运》第132页;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3—4、6、38—39、56、68、121页。

③ 崔瑞德、牟复礼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第142—144页。

④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220页;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164—167页;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第29—43页;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174页。

讲”，“由朱元璋一手创成”的明清体制“不仅为反动，而且绝对地不合时宜”。^①但另一方面，他又对明初政策予以合理化解释：“我们参照世界局势，觉得朱元璋全面的不合时宜，但是看到第二帝国试验的失败，则又只好觉得他重返传统的重农政策，以经济因素的落后部分作全国标准，印钞只作赏赐及赈灾之用，尽量保持低水准的雷同与均衡，并不是没有他设计的心眼。”^②“我们可以想见，由于宋朝以经济方面最前进的部门使财政上的资源整体化，遇到惨痛的结果，都有以后退却与保守调整之必要。”^③他在回忆录中也谈到自己的这种认识变化：“直到1971年之前，我仍然认为明清两代的制度包含着荒谬的成分，尤其在中国前几个朝代财政上采取行动主义的衬托之下，宋代就是一个例子。但是，等到我检视之前各朝代（包括宋代）的失败原因后，我才了解到，明代财政管理虽然在我们眼中显得愚昧短视，放在历史的全貌来看，却更正了前人的错误。因此，我们回溯历史时会感到讶异，因为许多荒谬的情况往前追溯时，都是当时开始合理化的里程碑。”^④

三、观察的角度与尺度：“洪武型财政”的变与不变

如果黄仁宇将“洪武型财政”的使用范围限于明朝前期，可能不会引起太大争议，很多明史学者对于朱元璋时代也做过类似的描述。使很多人感到不解的，是他认为明清财政虽然数百年间也发生一些变化，但一直是“只有零星支付局部需要的能力，而无全面经济动员打破局面之可能性”，“‘洪武型’之财政仍与第三帝国全始终”。^⑤他甚至断言“民国成立以来无法在财政与税收上找到出路，也仍是由于洪武型所创造的社会体制根深蒂固。”^⑥

黄仁宇做出这样的论断，很容易使人认为他对明代中后期赋役财政体制变革缺乏了解。在黄仁宇撰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时候，可供参考的相关论著确实远不如后来丰富，但中日学者业已发表了一批论述明代赋役变革的重要成果，包括梁方仲对一条鞭法的经典研究。黄仁宇对于明代赋役变革的过程和特点，诸如实物经济转变成货币经济、实物税收和强制徭役折纳白银、徭役摊入田赋等，有着比较系统的了解。在此基础上，黄仁宇仍然断言“洪武型财政”僵化不变，主要原因恐怕是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尺度与众不同。

这从黄仁宇对梁方仲观点的取舍上看得很清楚。他曾多次提到，“梁方仲认为明代虽在后期行一条鞭法，其范畴不出于‘洪武型’。”^⑦事实上，梁方仲所说施行一条鞭法后“没有多大的改动”的，是“洪武型的封建生产关系”而非“洪武型财政”，两者显然并非同一层面的问题。对于一条鞭法的历史意义，梁方仲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一条鞭法“为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从此便形成了近代以至现代田赋制度上的主要的结构”。梁方仲还提示，明代赋役折银以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

①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第30页。

②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166—167页。

③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183页。

④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281页。另外，他还谈道“我大可以说，现代中国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于明朝开国之初，因为当时将退缩的精神加以制度化……但我如果将明清两代和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相比较，结论将大为不同。由于各朝代无法未卜先知，只能尽力避免前人的错误。”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374—375页。

⑤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222页。

⑥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230页。

⑦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第13页。

亦不能不起了相当的变化”。^① 由于学术旨趣和问题意识不同,对于梁方仲这方面的思想,黄仁宇并不认同,他认为当时中国大陆学者——包括梁方仲在内——“对一条鞭法的描述很明显有夸大、误导的成分”。^②

关于“赋法与役法上的变迁”梁方仲作过系统梳理,后人研究亦多,尽管很多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清理和探究,但大体脉络已很清楚。但对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的变化,梁方仲只做了提示而未展开论述。刘志伟接续这个思路做了非常深入的思考,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他指出,明初实行“配户当差”,就是在里甲体制下,综核每个人户的人丁事产多寡,确定其负担能力,作为赋役征派的基础。其后随着赋役改革的推进,作为徭役课税客体的户逐渐分裂为丁和地(或粮),徭役银额被按比例摊派到丁额和地亩额(或粮额)上。类似的变化在明朝以前也曾出现,但赋役性质并未根本改变,导致明代赋役变革成为不可逆过程的关键因素是16世纪白银的大量流入与广泛运用。在以白银为手段的“完纳钱粮”赋税体制下,国家资源调拨采取了白银货币的方式,而不再是劳役征发的形式。这样,国家与百姓的关系,就从基于具体人身控制的“纳粮当差”的关系,转变为人民用不同的纳税账户名义向国家缴纳货币或实物定额比例赋税的关系,也就是“完纳钱粮”的关系。^③ 可以说,“一条鞭法的发展,代表了一种新的制度、新的国家、新的社会、新的经济体系形成的转型过程”。^④

近年万明以白银货币化为主要线索,围绕明代财政体制以及社会和国家转型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成果。她系统梳理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具体过程,认为先是自民间开始,自下而上地发展,到成化、弘治以后才为官方认可,然后自上而下地展开。其中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这也是明代赋役改革与历代赋役改革的明显不同之处。伴随商品流通与赋役改革,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市场前所未有的活跃起来,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制度的变迁,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整体由单一向多元的变迁。^⑤ 具体到财政方面,她认为“明代后期中央财政体系的基本特征,相对明初已经迥然不同,出现了向货币经济基础上的货币税收为主的财政体系的转换,这无疑是中国古代财政史乃至中国史上划时代的变化。赋役征收的货币化,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原则上转化为货币形态,意味着国家财政体系的根本性转变”,这种“变革实质上是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她对“洪武型财政”提出严厉批评,认为黄仁宇“没有看到所谓‘僵化’的‘洪武型财政’在明后期发生的巨大变化,更没有认识到‘倒退’的明代财政发生的重大结构改革、体系转型、近代趋向的划时代意义”。^⑥

黄仁宇业已去世,我们不知道他面对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会不会对自己的观点加以修改或调整。如果做个大胆猜测,我认为他会继续坚持己见。这首先是由于黄仁宇的观察视角与其他学者有所不同。其一,明代赋役财政体制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变化过程,学者们大多着眼于作为其变化趋向和结果的“理想型”,对其做出积极的评价和肯定。黄仁宇则比较强调变化过程的混乱和迟滞,认为

① 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第12、263页。

②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152页。

③ 参见刘志伟《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

④ 刘志伟《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415页。

⑤ 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第44—69、88—93页。

⑥ 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第57—58、74、76页。

“16世纪的赋役折银是一个旷日持久的、相当无规则的过程”，“这种改革运动在经过如此艰难的准备后，却从来没有最终完成”因为“明代财政结构不能适应如此彻底的重组”。在他看来，“一条鞭法改革只是修改了税收征收方法，但并没有简化基本的税收结构。相反，它使其更加复杂化了”。其二，其他学者比较关注赋税和徭役的征收环节，所以将折纳白银视为巨大的进步。黄仁宇关注的重点是财政管理，认为即使一条鞭法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中央政府既没有建立一个区域性的银库，也没有一个通常的采买机构”，“预算没有任何增加”，“税收解运仍然是由专门的接收部门对应专门的分配部门，没有什么变化”。在他看来，“尽管一条鞭法改革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并有很多的积极因素，却注定会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结果“新瓶装了老酒：除了运输途中的大量谷物换成了一包包白银之外，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之下，明代财政管理的基础却依然是早期实物经济的概念”。^①

除了观察角度的差异，导致黄仁宇认为“洪武型财政”并未改变的更加根本的因素，是他度量历史的尺度与他人不同。学者们指出的明代赋役财政体制之“变”，主要是从明朝后期与明朝初期的比较中得来的，而黄仁宇所说的“不变”，则是运用其“大历史”视角，从对近六百年来中西对比中得出来的，两者所说其实并非同一层面的问题。^② 黄仁宇强调，“洪武型”的财政制度，“对以后几百年的法律观念、科举制度、军事行动、乡村组织等等，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可见他反复陈说的“洪武型财政”，虽然最初是从明代财政研究中提炼出来的，但其内涵绝不限于财政体系本身，可以将其视为与“洪武型社会体制”等同的概念。在黄仁宇看来，清朝“最大的过错是过分承袭前朝”，以致“‘洪武型’的财政系统，虽然在清朝有些更动，其基本组织的方式，一直维持到20世纪。所以讲今日中国之改革，其历史上的对象，是明朝遗留下的社会经济系统，并非过分”。^③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黄仁宇眼里，“洪武型财政”实际上就是“在数目字上管理”（即近代化或资本主义化）的对立影像，^④只要财政、社会和国家未能达到他所定义的“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程度，就可以说“洪武型财政”或者“洪武型社会体制”仍在延续未变。据他考察，中国一百年来的革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完成，“其间最大的一个收获，则是今后这国家已能‘在数目字上管理’”。^⑤

结 语

黄仁宇的历史作品，往往论题宏大、东西交错、古今杂糅、夹叙夹议，时常把个人经历融入历史叙

①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94、120—121、150—155页；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第94页。

② 这种视角差异表现在黄仁宇对各种问题的研究中，并不限于明代财政。比如很多学者利用晚明小说集“三言二拍”描述当时商业的繁盛，而黄仁宇之《从〈三言〉看晚明商人》则大异其趣，他虽然承认当时“中国内河城市之繁华，尚可能为西欧诸国之所未及”，但其论述重点则在揭示当时“商人生活及商业习惯，以今日眼光观察之，实在质量上墨守旧规”，“16、17世纪，中国商业缺乏资本主义之性格”。参见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

③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423、427—428页；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168、230页。

④ 黄仁宇的“在数目字上管理”，很可能是从其对美国切身感受中概括出来的。他在《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中谈道：“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108页）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中，他也谈道：“提及西方社会形态，我也在书本知识之外有了在美国劳动工作十多年的事实作陪衬。”（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222页）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开场白中，他叙述了从自己居住的村庄纽普兹（New Paltz）可以看出“现代经济制度”亦即“资本主义”的三个基本条件（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第251—255页）。

⑤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133页。

事之中,呈现出与学院派迥然不同的风味。这种极具个性的学术旨趣和语言风格,必然会给其作品带来两极化的评价:一方面,其通贯宏阔的视野、痛快淋漓的锐评、随意散漫的文风赢得了无数读者,再加上他批判传统、拥抱西方的态度,正好契合了一些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的心境,其能风靡海内外数十年殆非偶然;另一方面,他以半路出家的“一己之力”纵论古今数千年、东西数万里,概念空洞、观点武断、史实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再加上其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遭到专家批评亦属必然。最使黄仁宇耿耿于怀的,可能是龚鹏程的评论“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之常识所惊”,“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①如果从“小历史”着眼,重点检视其论述细节,龚鹏程的说法未尝无据;但若从“大历史”着眼,重点领会其论述宏旨,龚鹏程的评语未免太苛。

黄仁宇对自己会招致的批评,可能早就有所预料,因此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做过说明“我的长处是能在短时间浏览大块文章,勾画其重点,但是生性鲁莽,不计细节。”^②这话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自谦,承认自己治学粗疏,在细节上不免出现瑕疵;一是自傲,认为自己善于把握历史的大关节大脉络,具体细节无关宏旨。黄仁宇也明白自己宏阔而大胆的议论很难得到史实层面的支撑,在《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中声明“我作此文,可以说是没有详细的事实根据去支持一种广泛的批评。可是虽如此,我们也可以用大眼光的逻辑推行,补救这缺点。”^③黄仁宇彻底地、决绝地批判传统中国的态度,颇使人感到失于片面和绝对,其实他自己对此未尝全无自觉。他在对“洪武型财政”提出严厉抨击后,马上又申明“这种观点只因我们在六百年后体会到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不能适应于外界新潮流之创痛才能产生。”^④因痛感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便以西方近代以来才形成的“在数目字上管理”,^⑤去衡量并批评朱元璋创立的财政以及社会和国家体制,指责其“不能预见工业和商业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⑥这显然不是研究历史的客观的、适当的态度。然而在“为了变革而认识”之学术旨趣的驱动下,黄仁宇却又不厌其烦地反复弹奏这个曲调,这恐怕正是“为了变革而认识”的史学之不可避免的特征。

尽管其立场与观点存在明显的偏颇,但如果仔细体会黄仁宇对明代财政体制的具体评述,我倒觉得不失“片面的深刻”,强烈的批判意识确实使他洞察到明代财政存在的一些体制性缺陷,他提出的一些具体论断也颇有启发性。宏观方面,比如黄仁宇强调明代财政结构特别复杂,他形象地比喻说“明朝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好像一条流入沼泽的河流,它有无数的分叉与会合。”^⑦相较前代,明代财

①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第13—14页。

②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0页。承认自己“生性鲁莽,不计细节”的黄仁宇,却又批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具体细节缺乏耐心”(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414页),这一点颇耐人寻味。事实上,黄仁宇的学术理路,与他批评的这些历史学家如出一辙,只是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先行观念迥然不同。

③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190页。

④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222页。据他分析,直到万历年间,明朝“与新兴的西班牙、葡萄牙的军事力量直接接触,虽然没有节节战胜,到底闭门自守,仍力有裕如。一直要等到两百年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工业革命已经展开的情况下……使明朝以来所提倡的内向性格和非竞争性的组织,无法存在”。他接着说明“我们指出明朝组织的守旧落后,是针对这种缺点而言。倘使不顾它以后的后果,写历史的人也可以把明朝的社会写得值人赏慕。”(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76—77页)

⑤ 据黄仁宇分析,英国的历史应以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为分野,在此时期以前,英国也是一个“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73页)。

⑥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2页。

⑦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3页。

政结构确实更加复杂,至今对其分叉与会合的复杂情形,特别是成因和机理,尚未完全梳理清楚,值得进一步探究。再如,黄仁宇认为“明代的财力要比4个世纪前的宋朝差了很多”,李龙潜曾予以批驳,认为“明代比宋代政府收入多,白银购买力强,反映了国势的强盛”,但其据以立论的数据不尽准确。^①宋明财力究竟孰强孰弱,甚至应以什么标准衡量和评估,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微观方面,黄仁宇也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线索,比如他谈道“力差”编银“只是为雇人应役者以及地方官提供了一种指导性方针,以便在几个应役者之间分摊职役的财政负担”,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要比编银数量高得多,因此,“从所有纳税人中间征收力差钱,并不能被认为是差徭已经改折的证据”。^②但在过去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并未充分注意这个问题。近年申斌、丁亮等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③加深了对赋役改革复杂性的认识。

断言明代税率过低,可能是黄仁宇最为流行的观点之一。晚明有很多批评税率过高的议论,对此黄仁宇不以为然。他根据一些地方志中的数据估算,直到16世纪之初,“整个帝国赋税的平均水平似乎也不超过农业产量的10%”,“这看起来是很低的”。^④黄仁宇对时人的批驳,未必能够成立。因为时人的议论是基于对总体税负的感觉而发,而黄仁宇的计算则仅限于额定田赋税率。正如他自己所说,“这种估算没有考虑到无偿应役、私派及火耗,也没有考虑到不同于大宗粮食的其他额外收入”;如果加上这些负担,“所谓税收水平低只是一种虚假表面上的现象”。^⑤可见,时人的议论并无不妥。黄仁宇之所以提出这种批评,目的是揭示明代财政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即“由于正常的税收收入不能弥补支出,必要项目开支就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⑥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后来,岩井茂树围绕“正额财政”和“正额外财政”这对范畴,对明清以至近代的中国财政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在财政体系实行‘原额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各种附加性课征的增大,并会造成财政负担的不均衡”。^⑦这可以说是对黄仁宇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深化和拓展。^⑧

总而言之,黄仁宇对明代财政的研究及其提出的“洪武型财政”这个概念,既不乏富有启发的洞

① 参见李龙潜《也评黄仁宇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明清论丛》第9辑。笔者认为李龙潜提供的两个重要数据,可能还需要斟酌。其一,据李龙潜计算,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的收入为46153余市石,而明万历六年(1578年)的收入为47831034余市石。《万历会计录》所说1461万系“复合单位”,李龙潜误认为都是白银,所以他计算的明万历年间数据明显偏高;而他计算北宋治平年间数据时,又误以贯除以文,从而低了1000倍,实际应为46153846市石。其二,李龙潜为证明明代海关收入远超宋朝,援引王临亨《粤剑编》中“余驻省时,见有三舟至,舟各贡白金三十万投税司纳税”,认为“每船纳税(包括水饷和陆饷在内)白银30万两,3船共90万两”。笔者认为,30万两当系装载的白银总数,而非纳税数额。根据林枫对明代嘉万时期市舶税的估计,月港、澳门岁入各约2万两(林枫《明代中后期的市舶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总数4万余两。

②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153页。

③ 参见申斌《明朝嘉靖隆庆时期山东均徭经费初探:基于〈山东经会录〉的分析》,陈春声、刘志伟主编《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丁亮《明代均徭役财政负担解析——以海瑞〈兴革条例〉为中心》,《西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④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235—239、410—411页。

⑤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226、238页。

⑥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57页。

⑦ 参见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付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一章。

⑧ 岩井茂树在《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注释中提到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但其学术观点是否受到黄仁宇影响,笔者不敢妄断,只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岩井茂树的看法似与黄仁宇颇有相近之处。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第28页注释2。

见,也不乏以今论古的偏见。他发出这些偏颇议论,并非因为对明代财政体制变化缺乏了解,而是出于要使中国变得“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愿望而有意为之。换句话说,他想通过对明代财政体制的“病理分析”找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同时为变革中的中国指明前进方向。黄仁宇的这种学术理路,是他独特的人生经历、鲜明的个人性格与其对中国走向西式现代化的强烈渴望深度融合、交互激荡的产物,尽管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并不符合史学研究的规范。历史学是一门讲求实证的学问,历史研究者应当秉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遵循论从史出的实证原则,把求实存真作为自己的天职。在阅读黄仁宇作品时,一定要充分体察其“准神学”的性质,以免“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①

(作者高寿仙,北京行政学院校刊编辑部研究员;邮编:100044)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苑苑)

《整齐世传——前四史人物列传编纂研究》

曲柄睿著,中华书局2022年12月出版,32万字。

该书在汉宋间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视域下,考察前四史人物列传编纂范式的形成;藉由人物列传编纂范式的延续与变革,讨论史家意图的流转变迁;关照列传编纂范式限定下的史传与其他文献的互动与整合。通过列传编纂这一命题,考察前四史形成的现实基础及其中蕴含的史学思想,乃至文学意识,反思汉宋间史学发展的情况及史学与社会政治的互动,进而揭示汉宋史学发展的脉络及其背后的深层历史动因。该书提出了“列传范式”的概念,指出为列传文献结构和文本写作提供限定的书写模式都可以称为“列传范式”。《史记》以人叙传,按照人物行事合传,按照时间顺序编次列传,构成了列传编纂的三个基本要素。《汉书》将按照人物行事合传修订为按照官职位次合传与编次,又增加“宗王传”区隔不同列传单元。至此,纪传体史书的“列传范式”基本定型。陈寿与范曄利用“列传范式”完成史书编纂,也表达了自己的史学意图。纪传体史书的出现是汉宋间史学发展的最显著的成果之一,各种史学体裁如编年体史书、郡国书、别传和家传都受到影响。“列传范式”对文本和文献的限定,也同样影响到前述各种史学体裁。

^① 萧公权指出“不曾经由放眼看书,认清全面事实而建立起来的‘假设’,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他还转述杨联陞之言,认为美国“史学家”的长处是富于想象力,如不加以适当的控制,他们可能会“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参见萧公权:《问学谦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this idea to frame historical narratives , undertaking the mission of building a common history of the nation to pave the way for the state building project.

Writing of Labor Concepts in Middle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in the Early Yea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Jiao Runming , Hong Yezhi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the state strengthened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th on core socialist values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history textbooks. Its goal was to instill students with a materialistic concept of labor to cultivate a worldview that respected working-class people and loved participating in labor. "Labor creates people" , "labor tools are the symbols of social development" , and "working-class people are the creators and promoters of history" were the core writing paradigm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revolutionary history paradigm was a reflection of the general social atmospher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which was focused on the promotion of materialism and of the glory of labor. It highlighted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working-class people and had extremely positive impact on society.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 Zhu Luchu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has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heritage. The accumulation of criticism on historical works over the course of thousands of years became the general trend of this sub-discipline and shaped its development. It both widened the scope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uplifted its theory. From commenting on history books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ing historiographical discipline , it furthermore induced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historiography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 crystallizing into a methodology of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This process both provided inspiration of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Exploring and revealing these paths and the law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more clearly why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an continuously develop into a knowledge , a discourse , and a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Knowing Is to Bring about Change: Ray Huang's Diagnosis of the "Hongwu-style Financial System" // Gao Shouxian

Ray Huang's research on water transportation and finance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not only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 academic career , but also the basis of his historical concepts. He called the financial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founding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 of China Zhu Yuanzhang "Hongwu-style Financial System" , arguing that this system had remained so rigid for such a long time that even continued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Huang's "Hongwu-style Financial System" has been gained a wide popularity and accepted by non-academic audiences , but it has also been severely criticized by some professional scholars. In fact , his historical research follows an approach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professional scholars. It is difficult to measure it by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His historical research was born out of his unique experience of war and chaos. In essence , it belongs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 political commentaries" with "knowing is to bring about change"; and his "Hongwu-style Financial System" can be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ve case highlighting the "absurdity" of the Ming dynasty's financial syste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 His position and views are obviously biased , if we carefully examine his specific comments on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 we may find many "profound but one-sided" views.

His strong critical thinking allows him to identify some institutional flaw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dynasty , and some of his conclusions are still quite enlightening to scholars today.

Th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History Workshop and the Rise of Social History in South Africa // Li Pengtao

In the 1970s , social history studies in South Africa flourish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anti-apartheid struggle , especially represented by the History Workshop at th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 Johannesburg. The Wits University History Workshop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universal African historiography , while representing its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The Wits University History Workshop had actively promoted a “bottom-up” approach to social history writing , taking history as a tool for anti-apartheid struggle. It strived to awaken the black people to think about their own historical status and to remember their historical mission. The workshop had greatly induced the rise of social history studies in this country , and i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n historiograph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cro-narratives in Western Microhistory // Wang Chaoqun

Microhistory 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the opposite of macrohistory and therefore regarded as synonymous with the “fragment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However , this is not the case. In fact , micro historians are active in constructing macro historical narratives while focusing on historical details. They have proposed the concepts of “normal exception” and “variable scale”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ir macro-narratives. In practice , they have establishe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micro-level , macro-level , and even global-level in history through identifying individual-society correlation , using symbolic metaphors , tracing changes , and offering thick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 to name some examples. Their effort to connect microhistorical research and macrohistorical narrativ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luralist academic context in which they lived. The entangl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history and macrohistory , especial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history , is instructive for us to step out of “fragmented” history and to establish a dialectical and pluralistic historical cognitive model.

How Can Historians Change the World ? Zheng Tianting 's Historical Practice and Its Significance // Hu Wei , Zhao Xingsheng

In order to carry forward the extraordinary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 especially of moder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 we need to pay equal attention to study general theories and to excavate historians' individual practices. By doing so , we can set up examples and offer guidance for future researchers. Historian Zheng Tianting's practice is a good example. He had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view on how to apply scholarship to changing the world: his “observation of the world” was to focus on national welfar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his “living by the world” was to follow the general trend of times; his “involvement in the world” was characterized by his excellent skills of applying scholarship to worldly practice , by his respect of moral values such as loyalty to the country and forgiveness to the enemies , and by his attentiveness to people's living need. His practice inspires us that academic research needs to be combined with concrete practice , and that , for a scholar , while individual scholarship is important indeed , public contributions by ways of worldly application are equally indispensable.